一部“天堂”与“地狱”之书

——再论《呼啸山庄》的主题

杨莉馨

摘 要:作为一部重构的“天堂”与“地狱”之书,《呼啸山庄》滑稽模仿了弥尔顿笔下有关“堕落”的神话结构,以对凯瑟琳、伊莎贝拉、耐莉、小凯瑟琳数位女性人物形象堕落版本的复现,演示了西方父权文化对女性的改造,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文化寓言。

关键词:《呼啸山庄》;神话结构;双性同体;堕落;文化寓言
中图分类号:I1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2-0143-05 收稿日期:2007-10-18

作者简介:杨莉馨,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10097

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的一部旷世奇书,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1847)在问世之初曾遭遇评论界的普遍贬抑。随着时间的推移,小说在艺术结构上的独创性逐渐获得读者的认同,其主题内涵的丰富性亦不断获得挖掘。尤其是在20世纪之后,对《呼啸山庄》的多元化阐释甚至可以被视为映照西方文学批评波浪式演进的一面镜子。精神分析学派批评家深为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独特的人格结构和相互关系所吸引,叙事学者偏爱这部作品看似笨拙却又复杂而特异的叙述结构,生态文学倡导者则从小说扑面而来的荒野气息中看到了艾米莉·勃朗特对文明的批判。笔者通过研读作品发现,小说深层还存在一个有关“堕落”的神话结构。艾米莉·勃朗特通过对这一神话结构的滑稽模仿,呈现了西方父权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再造过程,重构了自己的“堕落”故事。

这一被滑稽模仿的神话原型即《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的犯禁与被逐。17世纪英国清教诗人弥尔顿对这一故事又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渲染,在其伟大史诗《失乐园》中进一步强化了西方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取向。史诗中亚当和夏娃的映照、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以及上帝与魔鬼的冲突,无不表现出鲜明的厌女特征,弥尔顿也因而成为西方文学领域中大写之“父”的权威象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啸山庄》同样是一部“天堂”与“地狱”之书,再现了女性的“堕落”悲剧。事实上,小说主、次要人物对话中屡屡出现的有关“天堂”和“地狱”的想象与描绘,也一再提示我们作此方面的联想。然而艾米莉·勃朗特却是弥尔顿叛逆的女儿,她并没有依照弥尔顿心目中天堂与地狱的等级序列展开故事,而是对居于西方文化核心的父权观念进行了激进对抗。

一、“我就是希刺克厉夫”:凯瑟琳的“双性同体”

小说人物展开爱恨情仇的悲喜剧的主要背景呼啸山庄,与画眉田庄之间存在鲜明的对比,这一点长期以来已经获得批评家们的认可。高踞于贫瘠荒丘之上的呼啸山庄是粗糙、原生态的,与“过度倾斜”的“矮小的枞树”、“瘦削的荆棘”、“冻得坚硬”的“土地”和粗犷、暴躁的恩萧们相连。“‘呼啸’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内地形容词,形容这地方在风暴的天气里所受的气压骚动。”[1]2而画眉田庄则到处有精美的装饰物,它的缩影是林惇家族精致高雅的客厅:“纯白的天花板镶着金边,一大堆玻璃坠子用银链子从天花板中间吊下来”[1]42。这一景象俨然是对《失乐园》中“回生的明灯”(sovran vital Lamp)的滑稽模仿,暗示这里具有弥尔顿笔下合乎理性的天堂的性质。胆怯文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雅、沉闷乏味的林惇们正是在这里舒适享用着糕点、热茶和尼格斯酒等文明的成果。

小说是从一个外来访客的角度，引领读者进入呼啸山庄的神秘世界的。洛克乌德这个彬彬有礼、“教养良好”而又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物既代表了普通读者的好奇心，他第一次造访山庄的印象亦代表着来自文明世界的绅士对一个异己所在的迷惑与震惊。在洛克乌德眼里，呼啸山庄整个被一种乖张、仇恨、冷酷的气氛所包裹，仿佛某些嗜血巨人的巢穴。这里的人如“脸上带着几乎是恶魔似的讥笑”[1]10的希刺克厉夫、小凯瑟琳和哈里顿虽彼此相连，又被放逐于亲缘关系的纽带所代表的人类秩序之外。而暴力倾向最典型的代表，是那群狂吠不已、凶猛地扑向陌生人的狗。洛克乌德第二次造访呼啸山庄时那场突然降临的“令人窒息”的大雪，也让我们想到了弥尔顿笔下那作为“一个无底深渊”存在的、有着“很厚的积雪和冰”的地狱。正如弥尔顿笔下的地狱充满了嫉妒而争权夺利的魔鬼一般，呼啸山庄的人们似乎也生活在混乱之中，没有天堂中的等级链条作为结构性的原则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就没有由天堂中的上帝兼“大写之父”的美德、宝座和权力共同构建的和谐。于是，和洛克乌德一样，我们开始读这部小说时，也会断定呼啸山庄是一个酷似地狱的地方。

然而，凯瑟琳·恩萧向管家丁耐莉的倾诉却使我们对这一结论产生了怀疑：“如果我在天堂，耐莉，我一定会非常凄惨。……我只是要说天堂并不是像我的家。我就哭得很伤心，要回到尘世上来。而天使们大为愤怒，就把我扔到呼啸山庄的草原中间了。我就在那儿醒过来，高兴得直哭。”[1]75凯瑟琳何以将天堂与地狱的次序整个颠倒了呢？

还是让我们从老恩萧先生从利物浦带回的礼物说起。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不到 6岁的凯瑟琳渴望获得马鞭的愿望，似乎可以理解为缺乏权威的小女儿对力量的渴求。然而她父亲带回的却是一个“黑得简直像从魔鬼那儿来的”野孩子[1]32，这个成为代偿的孩子因而成为一根具有形而上的象征意味的鞭子。正是在获得了马鞭之后，凯瑟琳拥有了存在的完整性（fulness of being）[2]155-211。恰如凯瑟琳宣称“不论我们的灵魂是什么做成的，他的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1]75，以及“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他并不是作为一种乐趣，并不见得比我对我自己还更有趣些，却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1]77所表明的那样，希刺克厉夫之于凯瑟琳而言成为她的存在的补充，填补了她的所有匮乏，可以说是代表了她的真实自我的黑暗的影子。由此，凯瑟琳变成了一个完美的双性同体的人（androgyne），她与希刺克厉夫的结合也具有了双性同体（androgyny）的意义[3]80-82。

正是从拥有了完整人性的意义上，我们才得以更为深刻地理解当时的凯瑟琳何以“总是兴高采烈，舌头动个不停——唱呀，笑呀，谁不附和着她，就纠缠不休”；“在教区内就数她有双最漂亮的眼睛，最甜蜜的微笑，最轻巧的步子”[1]37。

由于从希刺克厉夫那儿汲取了反叛的能量，呼啸山庄在年轻的凯瑟琳眼里变成了一个天堂。凯瑟琳变得对约瑟夫那种伪善的宗教越来越具有叛逆倾向，对她父亲的清规戒律也越来越满不在乎：“她把约瑟夫的宗教上的诅咒编成笑料，捉弄我，干她父亲最恨的事”[1]37。此时的她忠实于自己的天性，保持着与自然息息相通的联系，焕发着野蛮的、未经文明驯化过的生灵所拥有的生命能量。

二、“别人的天堂在我是毫无价值的”：凯瑟琳的自我分裂

老恩萧的去世结束了凯瑟琳在自己的伊甸园中无拘无束的少女时代。根据长子继承法这一具有父权性质的律令，从文明世界归来的辛德雷成为山庄的继承人，因而成为新的“父亲”。凯瑟琳的堕落正是始自辛德雷的归来和婚姻。读过大学、接受过教化熏陶的辛德雷“瘦了些，脸上失去了血色，谈吐衣着都跟从前不同了”[1]40，他甚至破天荒地提议将某间屋子改造为客厅。虽然当年他向父亲索要作为文明的象征物的小提琴而未得，但他带回的新娘弗兰西丝、一个具有淑女风范的“家庭天使”却可以被看成一把象征意义上的小提琴，她与野性的凯瑟琳、希刺克厉夫之间的格格不入因而是必然的。辛德雷夫妇作为文明教化与父权统治在呼啸山庄的代理人，将双性同体的凯瑟琳—希刺克厉夫从呼啸山庄驱逐到了画眉田庄，并与那里的林惇家族合谋，最终制造了凯瑟琳与真实自我的分裂以及堕落。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由于辛德雷将这一对苦命人的天堂变成了地狱，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逃出山庄，来到了“一个漂亮辉煌的地方”[1]42，从窗户外向内张望，猜测要是换了他们在里面的话，“都会以为自己到了天堂啦！”[1]43表面看来，林惇家族的精致优雅确实带有乐园的风味。但是，两个孩子一旦进入它的内部，便立刻意识到这个天堂无异于地狱。正是在这里，作为画眉田庄的卫士的牛头狗从现实与隐喻的双重层面上将凯瑟琳“咬住”，造成了她的“跌倒”（fall）与“堕落”。随着林惇一家将“吉普赛人”希刺克厉夫从自家客厅里驱赶出去，凯瑟琳被迫与那个最强有力和必不可少的“自我”分离，并在此后长达五个星期的时间里，处于画眉田庄“天堂”般的生活的垂爱之下。

艾米莉·勃朗特告诉我们，凯瑟琳的堕落并不是坠入地狱之中的堕落。这一堕落是从“地狱”进入“天堂”的堕落，是从充溢着原始力量、焕发着蓬勃野性、与天地息息相通的自然状态，进入生命能量被窒息，被迫割裂与荒野的联系，想象力、热情、自由与智慧被抑制的状态的堕落。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分离，意味着女性被迫与她黑暗中的自我即撒旦所代表的力量的分离。正是这一分离，造成了凯瑟琳的痛苦与疯狂：“假使在十二岁的时候我就被迫离开了山庄，每一件往事的联想，我的一切一切，就像那时候希刺克厉夫一样，而一下子就成了林惇夫人，画眉田庄的主妇，一个陌生人的妻子：从此以后从我原来的世界里放逐出来，成了流浪人。你可以想象我沉沦的深渊是什么样子！”[1]118对于沦入“深渊”的女主人公来说，不是对上帝的丧失、而是对撒旦的丧失代表了她由纯真无邪走向成熟的痛苦阶段。光着脚丫、在荒野上纵情奔跑的野姑娘，被安置在沙发上、套上拖鞋，享用混合糖酒和饼干的过程，象征性地表现了自然被文明扭曲、改造的痛楚过程。凯瑟琳的堕落于是成为女性具有原型意味的堕落，作品也在此意义上成为一部表现女性经由痛苦的教育而脱胎换骨的成长小说，复现了简·奥斯丁表现凯瑟琳·莫兰在自我否定中成长的小说《诺桑觉寺》所呈现的女性主义的心理学内涵，因为奥斯丁的小说同样着重表现了“对一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充满想象力的少女的驯服过程，她最终在感情方面受到了一位富于理性的男子的控制。”[4]154由此，《呼啸山庄》成为西方妇女文学探索与呈现女性成长的传统中的重要环节。

由此我们发现，在《呼啸山庄》中，被父权制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观念斥之为“地狱”的地方，其实是一个自由快乐、生机勃勃的所在，而基督教描画的“天堂”却等级森严、僵化死板，并在表面的和善下暗藏杀机。艾米莉·勃朗特对弥尔顿堕落神话的大胆修正表明：文明秩序的建立，正是以女性的堕落、扭曲和牺牲这一惨痛代价为前提的。小说通过亲历了两大家族命运浮沉的丁耐莉精确到近乎残酷的叙述，忠实记录了凯瑟琳完整的教育和“成长”历程。

三、“可怕的东西！把他放到地窖里去吧”：凯瑟琳的堕落

由于落入了画眉田庄那个端庄稳重、要求女性拥有“女性特征”的“天堂”，凯瑟琳必须克制自己的冲动，以理性的铁链束缚自己的潜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淑女。当她说出希刺克厉夫“比我更像我自己”[1]75的时候，她似乎已经意识到：那个被放逐的“吉普赛人”的身体内部，比她自己身上保存了更多的原初自我。他在遭受残酷虐待和重重剥夺的境地之下依然显得完整而坚定，而现在的她却完全被成为淑女的愿望和自我否定的倾向所吸引。于是，五个星期后，“她不再是一个不戴帽子的小野人跳到屋里，冲过来把我们搂得都喘不过气，而是从一匹漂亮的小黑马身上下来一个非常端庄的人，棕色的发卷从一支插着羽毛的海狸皮帽子里垂下来，穿一件长长的布质的骑马服。她必须用双手提着衣裙，才能雍容华贵地走进。”[1]47

但由于凯瑟琳进入画眉田庄世界的形式是被迫的和充满暴力色彩的，因此，她努力使自己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也是痛苦不堪的。这一教育和“成长”的过程即是凯瑟琳的人格分裂，也即作为她叛逆的另一个自我、她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马鞭的希刺克厉夫从她身体与灵魂中的剥离。脆弱的伊莎贝拉·林惇乍一见到希刺克厉夫，即有那种文明世界本能的排异式反应：“可怕的东西！把他放到地窖里去吧。”[1]44正是在这段时期，凯瑟琳决定嫁给埃德加·林惇，并在丁耐莉面前为自己对埃德加的爱情辩护：“我爱他脚下的地，他头上的天，他所碰过的每一样东西，以及他说出的每一个字。我爱他所有的表情和所有的动作，还有整个的完完全全的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他。”[1] 73然而，这段夸张矫情的告白迅速为紧随其后、自我解嘲般的“好了吧！”三个字所颠覆，清晰地表明了凯瑟琳的爱情宣言有着对浪漫主义进行滑稽模仿的性质。而她对嫁给希刺克夫会“降低”自己身份的充满苦涩的解释，同样也是她接受的教育那无可避免的结果。

也正是在这段迷失和改变的时期，凯瑟琳在她卧室的窗台上刻下了那些具有象征意义、而后被洛克乌德发现了的名字，这些名字显示出凯瑟琳在身份抉择上的矛盾性：“那些字迹只是用各种字体写的一个名字，有大有小——凯瑟琳。恩萧，有的地方又改成凯瑟琳。希刺克厉夫，跟着又是凯瑟琳。林惇。”[1] 17凯瑟琳最终作出了背弃自我的抉择。这一抉择既导致了希刺克厉夫从呼啸山庄的出走，也造成了她自己大病一场、随后的衰弱乃至最终的死亡。作为凯瑟琳的真实自我而存在的希刺克厉夫断言：“我一点也不怀疑，她在你们中间就等于在地狱里！”[1] 144凯瑟琳本人对丁耐莉也辛酸地倾诉：“使我最厌烦的到底还是这个破碎的牢狱，我不愿意被关在这儿了。我多想躲避到那个愉快的世界里，永远在那儿：不是泪眼模糊地看到它，不是在痛楚的心境中渴望着它。”[1] 150由于对真实自我的背弃，凯瑟琳的心灵陷入了无可逆转的窒息状态，她的身体随之也走向了死亡。似乎只有在她的身体死亡之后，她的灵魂才可以重获自由，回到荒原之上的那个老家。她在疯狂的状态之下呓语：“为什么我变得这样厉害？为什么几句话就使我的血液激动得这么沸腾？我担保若是我到了那边山上的石南丛林里，我就会清醒的。”[1] 118因此，她所渴望的即是从自我的分裂状态中恢复过来，回归童年时代那种双性同体的整一状态。

小说中的“窗户”作为自然与文明的临界点，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多萝西·凡·根特认为，《呼啸山庄》中的窗户始终代表着通往可能性的出口[5] 153-170。来自荒野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正是从窗口窥看画眉田庄的世界并陷落其中的；凯瑟琳死后 20年，也是从窗户外面，她的幽灵向吓坏了的洛克乌德伸出了冰冷的手指；在画眉田庄，凯瑟琳在窒息之下乞求丁耐莉的，是“把窗户敞开，敞开了再扣上钩子！”[1] 118以便她可以呼吸到一口“来自荒原”的风的气息；在故事的尾声部分，希冀着与凯瑟琳重逢的希刺克厉夫绝食死去的地点，也恰在敞开的、倾盆大雨打进来的窗户前。希刺克厉夫狂喜地对丁耐莉说：“我告诉你我快要到达我的天堂了；别人的天堂在我是毫无价值的，我也不稀罕。”[1] 310这个“天堂”即是灵魂破窗而出、重获自由的荒原。

四、“他们可以勇敢地应付撒旦和它所有的军队”：堕落故事的其他版本

如果说凯瑟琳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衰弱与死亡，构成了《呼啸山庄》前半部分的显在主题的话，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则提供了凯瑟琳故事的不同版本。凯瑟琳的堕落仿佛在河面上丢入了一粒石子，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其后出现的一系列与之形成同心圆关系的故事，堪称艾米莉·勃朗特对凯瑟琳故事的复述。作家仿佛在不厌其烦地暗示我们：女性的堕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严峻真实。

和凯瑟琳一样固执任性的伊莎贝拉同样是一位冲动型的“小姐”，并在少女时代逃离了哥哥掌权的家庭。但是与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双性同体迥异的是，伊莎贝拉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性别身份社会化的鲜明印记。作为父权中心文化为年轻淑女精心设计出来的类型化形象的样板，她有着一张“多愁善感的蜡一样苍白的面容”。她在浪漫主义精神的诱导下，误将希刺克厉夫想象为一位有着高尚心灵和浪漫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她逃离了画眉田庄，满以为会有一个同样精致文雅的家在等待着自己。殊不知被文明教养起来的她是无法与撒旦般的希刺克厉夫共存于一个屋檐下的。这才有她偷偷写给丁耐莉的信中的质问：“希刺克厉夫是人吗？如果是，他是不是疯了？如果不是，他是不是一个魔鬼？”[1] 128然而由于她的误入歧途，她在自我放逐的过程中同样遭到了以哥哥为代表的父权文化的放逐与惩戒，她的堕落因而可以被看成是理查逊笔下遇人不淑的克拉丽莎·哈娄悲剧故事在 19世纪的新版本。

至于丁耐莉，正如她自己所承认的：“我的心毫不变更地总是依附在主人身边，而不是在凯瑟琳那边。”[1] 101作为父权制度下具有典范意义的管家婆形象，她受雇把属于男主人的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为他们整理客厅，教育他们的女儿，关上屋子里的窗户，在凯瑟琳扑向窗口时保持高度戒备的状态，并在故事叙述中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说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教倾向。在整部小说中，她通过扮演父权制度下端庄持重的代理人的角色而获得了文化的庇护，避免了凯瑟琳式的堕落结局。

再来看小凯瑟琳。虽然说她的母亲是个冒冒失失的野丫头，小凯瑟琳却有望成为完美的维多利亚式的天使。由于丁耐莉取代了凯瑟琳，实际上扮演了她养母的角色，她又拥有一个文质彬彬的父亲，小凯瑟琳自然会成长为一位淑女。她所有的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女儿身份、妻子身份和母亲身份相连。她照顾自私乖戾的小林惇，为希刺克厉夫煮茶，帮丁耐莉挑捡蔬菜，教哈里顿读书，还用从画眉田庄带来的鲜花取代了呼啸山庄的野生黑醋栗。在她的介入和帮助下，遭受希刺克厉夫剥夺的哈里顿终于能认出创建于“一五〇〇年代”的古老山庄正门上镌刻的第一位父权家长“哈里顿·恩萧”的名字了，这就为他恢复山庄主人的合法地位作好了准备。在渴望着“到达我的天堂”的希刺克厉夫终于死去之时，伪君子约瑟夫大叫“魔鬼把他的魂抓去啦”，并“跪下来，举起他的手，感谢上天使合法的主人与古老的世家又恢复了他们的权利。”[1]312丁耐莉“所有的愿望中最高的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合”[1]293，而洛克乌德也注意到了这一对情人“在一起，他们可以勇敢地应付撒旦和它所有的军队”[1]313。随着小凯瑟琳与哈里顿·恩萧的结合，作为地狱的呼啸山庄被改造成了画眉田庄般的天堂，父权制统治的历史链条得以接续，父权秩序也得以恢复。

没有合法身份的凯瑟琳和希刺克厉夫的幽灵消失在自然之中。这一自然作为具有地狱特征的天堂，成为了它们栖身的家。更加驯服或愿意接受教化的小凯瑟琳和哈里顿则通过阅读和书写，移居到由客厅、炉火、鲜花和书本装点的文明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具有弥尔顿心目中天堂的性质。所以，关于小凯瑟琳的成长和“堕落”故事，列奥·伯萨尼如此评价道：“这就好像艾米莉·勃朗特把一个同样的故事讲述了两遍似的”，“而在第二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她又取消了第一个故事的独创性。”[6]203“独创性”的被“取消”，正表现了父权制社会惩戒、改造或收编女性的普遍性。

由此，作为一部重构的“天堂”与“地狱”之书，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通过一个新的“失乐园”故事的书写，以对数位女性人物形象堕落版本的复述，成为一则耐人寻味的文化寓言。

参考文献：

[1]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M]. 杨苡，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0.

[2] See J Hillis Miller, The Disappearance of Go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3] See Carolyn Heilbrun, 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New York: Knopf, 1973.

[4] Sandra M. Gilbert &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 The Madwoman in the Academ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 See Dorothy van Ghent, The English Novel: Form and Func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1.

[6] Leo Bersani, A Future for Astyanax.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责任编辑：陆　林）

A Book About Heaven and Hell: A Further Study of the Theme of Wuthering Heights

YANG Li-xin

Abstract: With an intention to reconstruct Heaven and Hell, Wuthering Heights parodies the mythological structure of sinful fall in Milton's epic. With narrative presentations of fall stories of Catherine, Isabella, Nelly Dean and Catherine II, Wuthering Heights shows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 in western patriarchal culture, hence a thought-provoking cultural fable.

Key words: Wuthering Heights; mythological structure; androgyny; sinful fall; cultural fable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